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学术丛书

丛书主编 柳礼泉 沈其新

刘晓玲 著

“两个先锋队”思想 的历史地位研究



湖南大学出版社

HUNAN UNIVERSITY PRESS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学术丛书
丛书主编 柳礼泉 沈其新

“两个先锋队”思想的 历史地位研究

刘晓玲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8年·长沙

内 容 简 介

本书把新时期我党提出的“两个先锋队”思想摆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现在与未来的总体坐标上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与探讨，以历史与逻辑、比较与分析、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两个先锋队”思想的历史地位作了系统的研究：从理论的高度论述了“两个先锋队”思想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从历史的角度论述了“两个先锋”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 80 多年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从着眼现实与未来角度论述了“两个先锋队”思想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未来的胜利之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两个先锋队”思想的历史地位研究/刘晓玲著.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7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学术丛书/柳礼泉，沈其新主编)

ISBN 978 - 7 - 81113 - 414 - 8

I. 两... II. 刘... III. 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研究

IV. D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2635 号

“两个先锋队”思想的历史地位研究

“Lianggexianfengdui” Sixiang de Lishi Diwei Yanjiu

作 者：刘晓玲 著

责任编辑：谌鹏飞

封面设计：吴颖辉

出版发行：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410082

电 话：0731-8821691(发行部), 8821339(编辑室), 8821006(出版部)

传 真：0731-8649312(发行部), 8822264(总编室)

电子邮箱：presschenpf@hnu.cn

网 址：<http://press.hnu.cn>

印 装：国防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本：870×960 20 开 印张：11.4 字数：214 千

版次：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81113 - 414 - 8/D · 107

定价：22.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

在历史和现实之间

——序刘晓玲博士《“两个先锋队”思想的历史地位研究》

第一次“认识”刘晓玲博士是在“理论上”——那是2000年的湖南省社科规划课题评审会上，我作为评委，恰好被分配审读晓玲博士申报的课题论证报告，由于报告除了选题很好之外，还写得规范，又论证有力，我便主动向评审组作了推荐。过了一年多，我们有了一个在“实践上”也“认识”了的机会。因为交谈时间不短，话题转到了她的课题上。记得当时我说过，课题报告“确实写得很好，至今有些话我还背得”。此时，她那在公众场合受到赞赏而喜悦的脸上，突然通过“眼睛”的特别作用而显露出几分疑问来——

“背得”？

此刻，我觉得有作深入说明的必要——

不是报告全背得，而是其中有些话背得，譬如，在论到思想和理论对实践的影响力时，论证报告中引用了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中写的“最终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是思想，而不是武器”。报告并以此证明要警惕和平演变理论的影响和渗透。

后来，我请朋友帮忙搜索了一下，结果，不但查出了这句话，还将意思相近的如下两句也录了下来：

——经济学家凯恩斯曾断言“支配一个社会运转的主要力量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曾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说过“当历史的尘埃散尽，使我们名垂青史的不是战争或政治上的胜利，而是对人类精神的贡献”。

见我如此认真地读到她论述的问题及其对问题的论述方法，并由此还将其中所转述的话语也记了下来，在出版了《“两个先锋队”思想研究》一书后，她主动赠送了一本给我。由于受“最终”是“思想”的思想作用，我在将这“思想研究”的书读完之后，又与之谈过一些

关于“思想”的“思想”。

2006年，我院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组织撰写《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遇到的五大理论问题》一书，在研讨问题的过程中，我特意写了一封短信，要青年研究人员陈三奇博士送到晓玲博士那里：“请免费送书五本，供作者写书参考。”在讲究经济效益的今天，我还特地加了一句：“这里，虽没有经济效益，但肯定有社会效益！”

真没想到，“没有不付费的午餐”的经济学名言，在我们这班不以经济效益为劳作目的的理论工作者之间也有了相应的体现：前几个月晓玲同志将博士论文《“两个先锋队”思想的历史地位研究》送上，在“敬请指教”的客气话后又客客气气地加了一句：“准备出版，请赐序言！”但是，在这样的问题上我却“客气”不起来：“对这个问题没研究！在这个领域没权威。”言下之意是“写序言没资格”！在我的话语刚落音时，她迅速“理论”开了：“两年前您组织撰写的由红旗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遇到的五大理论问题》在半年内印刷了两次，去年又在红旗社出版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哲学》，目前正在研究撰写《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听说还准备出版系列丛书？这些都属于党的建设理论研究范围啊！”

也许是出于对她关注我院研究动向及成果反响的感激，此刻，我这向来快言快语的人，竟一时语塞了！

兴许，人类社会生活中很多具体事情就是这样在历史和现实的内在联系、主体与客体的双向关注、逻辑与情感的表达时差中给“偶然”地“敲定”了！

值得庆幸的是，我在“认真看书学习”的同时，居然也生出了一些可以叫做“体会”的东西来——

将课题盯在难题上

问题出课题，这已是科研工作的基本常识。差别在于，作一个课题虽然都会盯住一个问题，然而未必每个研究人员都敢于盯住一个难题。因为敢于做难题既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既需要学术力，更需要使命感！！

在当今中国的社科研究领域，难题可谓不少。但既需要智慧又需

要勇气，既需要学术力，又需要使命感的难题莫过于政治领域，在政治领域中又莫过于党建理论。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的执政党，其地位和作用决定了不少人都想在党建理论上“说话”，不少人都能在党建理论上“说话”。人类社会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恰好是在不少人都想“说话”和不少人都能“说话”的“话题”上最不好“说话”。立场的迥异，观点的差别，方法的不同是最不好“说话”的根本原因，而学科殊异、视点有别、学力等差也成了最不好“说话”的特别缘由。

“两个先锋队”思想就是这么一个最不好“说话”的“话题”，因而也成了难题中的难题。晓玲博士做课题时敢于选择这个难题，并在几年前就一直盯住这个难题，且不断深化，不断完善，说明她是一位有智慧、有勇气、有学术力、有使命感的学者！

将现实联在史实中

在论及研究成果时，人们时常将那些善从现象中抽出本质的叫“有深度”；善从 A 事物推及 B 事物的叫“有广度”；善从历史中洞见现实的叫“有高度”；若三者兼而得之，就会被称曰：“有力度”！！

晓玲博士这篇文章，是研究“现实”问题的，并且如前所述还是一个很有难度的现实问题。因为，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庆祝我党成立 80 周年大会上强调“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之后，党的十六大还将这一思想写入了这次大会通过的新党章。这样一来，既引起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极大关注，也引起了一些同志的担心。担心这样会不会模糊党的阶级性，影响党的先进性，会不会把我们党变成“全民党”。

全部“问题”就出在这里，因为这个问题太大——关乎治党、治国、治军，同时这个问题也太广——涉及内政、外交、国防；加之这个问题也太深——内含政治、经济、文化。如前所述，唯其如此，不少人想“说话”；不少人爱“说话”；不少人敢“说话”；不少人会“说话”……这样，在论坛上，在著作中，在文章里，在交谈间就出现了不少不“一心”的话、不“一致”的话、不“一贯”的话；同时，也出现了不少无逻辑力的话、无说服力的话、无战斗力的话；并且，还有不少应景的话、表态的话、凑数的话，甚至还出现一些不切情的话、不合理的话、“不像话”的话。于是乎，“社会科学”研究和宣传中的

“不科学”、“伪科学”和“反科学”的“评说”就难免出现，进而，“社会科学”研究和宣传中的神秘感的缺失、影响力削弱、权威性的降低也不足为怪。以至在这“瑕瑜互见、鱼龙混杂”的境况中，社会科学领域至今未设全国大奖，社会科学领域至今未设院士。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难处，也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苦衷。但以服务党的事业、服务全国大局、服从社会需要为使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一样，深知“事实”是一切科学的研究的“依据”，尊重“事实”是一切科学的研究的“铁律”！

晓玲博士深通此道，深谙此理。在研究中不但依据事实、尊重事实，更为高超的是，为了说服人们不必担心的担忧，为了说明我党没有变道的变化，文章从一开头就将现实联在史实中：从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到十六大修改的《党章》，从马克思的想法到毛主席的做法，从邓小平的说法到新党章的写法，无不一脉相承，无不一以贯之。

将党情嵌在世情里

有人说，在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中，最具风险性的是政治活动。此言固然有“绝对”之嫌，但也在一定意义上道出了政治活动的复杂和难度的因由。一般政治活动如此，党的活动尤然！也惟其如此，我党才要求全体党员理论上要清醒，政治上要坚定。胡锦涛同志才一再提出全党要增强忧患意识。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政治活动——尤其是党的活动——特别又是事关执政党的活动，制约因素太多，干扰事件不少。事的繁复、人的杂存，史的牵扯、时的变更，右的进攻、“左”的干扰，内的涌动、外的衍射，上的议论、下的呼声……这就要求我们认识党情、制定党策、处理党务，既要重视微观的操作，更要注重宏观的战略。而要切实有效注重宏观战略，就必须在科学认识党性、国情、世情的基础上才能做到。问题还在于，党情、国情、世情“三位一体”，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还相互“规定”。这样，以大见小，以微见著就显得十分必要。如是，在事物的“对立面”中研究事物，正像要在“静止”中认识“运动”一样，要科学地认识党情、把握国情就必须透彻地了解世情和研究世情。要把党情、国情“嵌”在“世情”中去认知、去把握、去研究、去应对，以便在科学把握全部情态的基础上“规定”党性、制

定党策、处理党务。

晓玲博士为了阐释、说明、论证党的“两个先锋队”思想的历史地位，把党情放在国情中去认识，放到世情中去把握，以便在“规定”和影响自身的存在状态、属性功能、运作模式、运行机制、运动效果的“对立面”中认知“自我”，把握“自我”和“规定”“自我”。

这，不仅仅是一种因“国际视野”而使眼界开阔，心胸宽阔的论说要求，更是一种因“辩证思维”而使思路清晰、认知深刻的理论智慧。

职是之故，晓玲博士才下那么大的力气描述党情的变化，费那么多的笔墨分析世情的新态，用那么多的时间寻求国外政党兴衰存亡的历史教训。或许，只有这样，才能使困惑者豁然，使担心者释然!!

将能力显在智力处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主办的《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7年第2期上，刊载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赵文洪研究员《人文学科管理中规章制度与领导者个人作用的关系》一文，该文在谈到这些年来科研队伍人才招聘时说：“目前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是是没有对智力情况的考试”，并指出目前的招聘制度“往往达不到真正了解一个人智力素质情况的目的”。这里强调的“智力”问题，确实是个重要问题。因为，这些年来，报纸杂志多了、研究人员多了、“成果”数量多了，加之得学位的渠道宽了、评职称的标准乱了、发文章的队伍杂了……再加之，社会科学的应用性特征要求语言的通俗性从而减少了因“读不懂”而具有的“神秘性”。于是乎，在社会上造成了一种错觉——一发文章，就叫有了科研成果；一有了“成果”就叫有研究能力。其实，这样一来，人为地捧高了一些人，也冤枉地降低了一些人。这使一些不能搞科研的人“混”进了科研队伍，得到了不应有的学位和职称，也使一些真正能搞科研的人失去了学术威望，得不到应有的地位和待遇，并进而导致一些人轻视社会科学、藐视社会科学。而真正能搞社会科学研究的又因为未“理”清和没“论”明的原因而全无职业的自豪感！

看来，对这类问题，是到了该有一些“说法”的时候了！

新近，一位领导在会上强调道德践履的主体自觉性要求时说：“想

当官，要有机遇；搞科研，要有天赋；讲道德，全在自我。”我想，只要唯物辩证地理解“天赋”的含义，并且是在强调搞事情的条件性意义上理解，这一论说无疑是正确的。它与赵文洪同志强调的科研要有“智力”在“素养”的层面是共通的。尽管或“天赋”或“智力”或“素养”都可以在主观长期努力的进程中得到提高，但在一定的个体中和一定的时段里，针对特殊的工作，总该有特殊的标准。

注重和强调科研中的“智力因素”和科研人员的智力水准，对于选拔科研人才、强调素养提高和提升成果质量无疑是有现实意义的。

上述“想法”和“说法”，似有“文不对题”之嫌。但只要真正像我一样将本书一字一句地读过并且一章一节地想过，就绝不会对我这管理了一些报纸和杂志的人生出为争“篇幅”或为抢“阵地”而在人家嘱我写序时“趁火打劫”的嫌疑，反而会像我一样，为晓玲博士在论著中以“步步为营”、“层层演进”的形式所展示的逻辑力量和智慧光芒而惊叹！！

有能力的人未必能写作，有写作能力的人未必能研究。只有把能力用在写作中，在写作中凸现科研所应有的智力，这样的成果才能叫做科研成果，这样的人才能叫做有研究能力的人。在晓玲博士这一论著中，让我们领略到了一个有科研写作能力和科研智力水平的科研工作者的风采！

在读书的过程中，我也碰到了一些未曾完全弄明白的问题：一是书中说，“如果执政党把社会各阶层的优秀分子总是拒之门外，不仅会影响执政的影响力，而且事关执政的安全”。为什么“事关执政的安全？”书中作了一些论述，但对“使未来可能产生的社会动荡提前消弭于无形之中”未做深入、细致的论说。我以为，作为宣传文章可以就此“打住”，但作为博士论文，似需进一步作深入的甚至是限制性条件的分析。二是在谈到理论创新类型的第五点时，引用了董京泉同志的“重提或凸显已被后人遗忘、淡化或埋没了的前人提出的某些有价值的思想原则和观点，使其发扬光大”。文章虽然按规范作了一个脚注，但“为什么”这样说，应当有结合时空条件与理论效用关系之类的更深入的“说法”才好。

临了，需要说明的是：因工作原因，我把论文带到甘肃、青海、

宁夏阅读，将序言带到娄底、邵阳、衡阳撰写，虽已历经数月，但由于时间的断断续续，导致了文字的零零散散，如果还不付稿，肯定有人会讥笑我缺乏作“序”的基本“智力”条件，故就此打住，也算是序。

朱有志

2007年9月23日凌晨4点于衡阳

总序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联手写就的一部皇皇著——《共产党宣言》，宣告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160年来，发端于欧洲的共产主义“幽灵”，影响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马克思主义对于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运动实践者而言，是指引方向的伟大旗帜，是团结一致的精神纽带，是一往无前的动力源泉，是开拓创新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展示的真理之光与万钧之力，实现了人类理性的大觉醒，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大变革。

马克思主义的“圣火”传到中国，是90年前的事情。1918年，年仅29岁的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成为第一个“播火者”。90年来，马克思主义以其耀眼的光芒，照亮了中国人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行进历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的过程，也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和民族化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斗的壮丽史诗，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正如十七大报告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和宣传者，出于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与爱好、责任与义务，我们以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者为作者队伍，组织出版这套“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学术丛书”，其主要目的有三：

第一，研究理论，繁荣学术。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远止境。我们处在一个创新的时代，各种新情况层出不穷，要实现与时俱进，就必须始终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根植于活生生的实践中，站在时代的前列，根据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不断融入新的思想和

新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体现时代的精神。因此，树立问题意识、立足现实问题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是理论工作者最可贵、最基本的思维品质与心理态势。问题意识是常青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研究的逻辑起点。本丛书的选题宗旨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程及其产生的重大成果，作出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

第二，建设学科，促进发展。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升格“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并在全国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这是一项带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举措，它给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学科是特定研究领域走向成熟的产物，也是研究领域制度化与建制化的结果。学科建设通常包括学科、学科制度、学科建制、学科划分、学科设置等多种要素。对于马克思主义学科而言，学科建设的任务，主要包括凝炼方向、会聚队伍、构建基地。深化相关专题的研究，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博士点、硕士点的发展，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建设性工作。

第三，凝炼队伍，打造团队。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建设已经进入到一个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齐头并进的历史发展阶段，每一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都必须同时从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三个层面来发展自己，否则就难以完成新时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任务。学科建设不仅提升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水平，培养了教师的理论思维，而且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我们希望更多的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坚持改革与创新并举、教学与科研相济，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的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与水平，通过几年的扎实工作，凝炼一支基础扎实、思维活跃、教学过硬、团队协调的研教结合型队伍。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学术丛书敬呈本学科的专家与同仁，以期取得抛砖引玉之效。

柳礼泉 沈其新

2008年1月

目 次

在历史和现实之间

总 序

第一章 导 论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两个先锋队”的内涵	8
三、研究现状	11
四、思路与框架	14

第二章 “两个先锋队”：与时俱进的

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

一、“两个先锋队”：党的性质的新概括	18
二、“两个先锋队”：执政规律的新认识	40
三、“两个先锋队”：党建理论的新发展	50

第三章 “两个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

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一、创立“中国工人阶级的大的群众党”（1921～1927年）	78
--------------------------------------	----

二、“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1927～1949年）	98
三、“扩大党组织的工人成分”，为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进性而斗争（1949～1978年）	117
四、与时俱进，夯实党的社会基础，永做“两个先锋队”（1978至今）	137

第四章 “两个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之旗

一、“两个先锋队”：永葆党的先进性的必由之路	155
二、“两个先锋队”：应对国内外各种新的风险和挑战的重要法宝	160
三、“两个先锋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164

第五章 新时期如何实现“两个先锋队”

一、坚持与时俱进，始终做到“三个代表”	176
二、坚持党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的统一	185
三、坚持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统一	190
四、坚持从严治党，努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196

参考文献

后记

第一章 导论

一、问题的提出

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之中。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这充分揭示了成为“两个先锋队”是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基本特质。但是，理性认识党的“两个先锋队”性质并把党的“两个先锋队”性质写进党的章程却是党成立 80 年之后。从党的一大到党的十六大 8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党对自身的“两个先锋队”性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从党的纲领、有关决议特别是党章的变化中充分体现出来。

1921 年 7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没有制定党章，却制定了第一个纲领，宣布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系列原则。这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一个完全新型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武器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无产阶级政党。

1922 年 6 月召开的党的二大通过了史上第一个党章，按照列宁建党理论和俄国党的经验，结合建党一年来工作的体会，对党建一系列原则做出了规定。在二大通过的决议案中首次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的忠实代表。从 1923 年的三大到 1928 年召开的六大历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只是在二大党章的基础上加以修订。在党的性质上，还是继承二大决议案的观点，也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观点。

与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认识相联系，在党的工作任务上，党中央曾长期坚持“城市中心论”；在党员队伍建设方面，则过分注重

党员的工人阶级出身，陷入了“唯成分论”的误区。关于入党条件，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在加入我们的队伍之前，必须与力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① 在这里，党员应具有的社会成分并没有特别要求，而只是强调了“承认党的纲领和政策”、“必须与力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当然，这也杜绝了让剥削阶级加入共产党的可能性。以后的中共二大、三大、四大、五大党章关于党员的规定，基本上与上述规定没有根本的差别。1927年6月1日，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明确指出了党员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劳动者（工人、农民、手工工人、店员、士兵）”，另一部分是“非劳动者（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等）”。^② 从具体的对象来看，这里的“非劳动者”是指非体力劳动者，从而大大增加了党的群众基础。但党的八七会议以后，指导思想上逐渐“左”倾，陷入了“唯成分论”的误区。强调只有工人成分在党内占大多数，才能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1928年7月召开的党的六大仍继续片面强调工人成分，在选出的36个中央委员中，有21个是工人，很多优秀知识分子干部参加中央工作受到了限制，如刘少奇、恽代英等都没有被选进中央委员会，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总书记，将“唯成分论”演绎得十分彻底。六大以后，“唯成分论”的错误在党中央实际上占据了统治地位。“唯成分论”的错误不仅严重影响了党的队伍的发展壮大，而且严重影响了党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给党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

1935年华北事变的爆发，使得国内局势突变，国内阶级矛盾发生重大变化，国内政局即将出现重大转折。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面对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中国共产党如不能顺应全民族当前的根本利益，适时转变自己的政治路线和策略路线，把自己融入国家的政治生活主流，尽快使自己从一个地方性的割据势力变成一个在全国政治生活中

^① 盛继红：《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② 盛继红：《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

有广泛影响的政治势力，就有脱离历史潮流，脱离民族大众的危险，就不能证明自己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和“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者”。^① 历史迫使中国共产党必须对于自己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进行深刻反思。事实上，大革命失败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实践中，面对“两头小，中间大”的中国社会和农村环境进行革命和党的建设的特殊状况，坚持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纠正了“唯成分论”的错误，在实践中创新，冲破了“唯成分论”的误区，吸收了一大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先进分子入党，从而大大增强了党的阶级基础，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在坚持发展和壮大党组织的同时，又创造性地提出实行“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强调在“红军党内”开展教育，从思想上建党，这样，又实现了理论上的创新，从而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思想建党”实践与理论的突破，极大地促进了党和红军的发展壮大，也使人们对党的性质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刚刚结束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35年年底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提出，党的现时策略路线是要建立全中国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此，必须坚决纠正党内的主要危险——“左”倾关门主义。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首次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们应该大量吸收先进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国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一切在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中的英勇战士，都应该吸收入党，担负党在各方面的工作”。这就突破了过去单纯以党员成分判断党的性质的观念，对党员成分与党的性质的关系作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正确的分析。决议还指出，由于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与殖民地社会，农民分子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常常在党内占大多数。但这些丝毫不减低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的地位。只要能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

^①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1～63页。